

诚信的决定过程及其与经济的关系

文建东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本文利用效用最大化模型分析了个人的诚信选择及由此决定的社会诚信水准，并讨论了诚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个人对诚信的选择是该人在与他人进行交易博弈的社会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影响个人诚信选择的决定因素有个人财富、能力和所受的教育、社会制度文化因素、信息流动性和经济发展程度等。诚信和经济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一方面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诚信程度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诚信体系是否完善影响着经济发展。一个内生的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表明，当一个社会拥有百分之百的诚信时，经济增长是最快的，但这一增长路径并非个人自动选择的。

关键词：诚信；经济发展；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论

诚信缺乏是我国市场经济活动中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也引起近几年我国理论界的热烈讨论，讨论遍及经济学界、法学界、社会学界等各个学科。不过，在国内经济类主要学术期刊上，有关诚信的文章并不是太多，更多的文章则出自一些非学术性的报刊杂志。总体而言，国内的文献从经济学角度讨论诚信时都强调了失信的收益与成本，也有部分应用到了博弈论。不足之处是，虽然借鉴了经济学的有关概念和原理，但利用现代经济分析方法较少。

国外经济学界讨论诚信的理论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以声誉（reputation）或信誉（credibility）为主题进行分析，大量利用了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的方法。Kreps 和 Wilson 讨论了不对称信息下的企业声誉建立问题（Kreps and Wilson, 1982）。在产业组织理论中，这一理论应用得非常广泛。这构成了关于声誉或信誉的基本理论。

第二，在很多具体问题上广泛讨论了诚信问题。其一是关于政府货币政策的争论。这一争论的核心实际是政府的政策如何取信于民，是一个政府诚信问题。卢卡斯（R. Lucas）引入理性预期指出了政府政策有效性和政府诚信之间的关系（Lucas, 1972）；基德兰德（Finn 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E. Prescott）在一个动态博弈的环境中分析了政府诚信对政府和公众之间政策博弈的影响（Kydland and Prescott, 1977）。其二是银行中的借贷关系，在相关研究中强调了信息是否完全和博弈是否重复进行对诚信的影响。凯默雷（C. Camerer）和韦格（K. Weigelt），麦克凯韦（R. D. McKelvey）和帕夫雷（T. R. Palfrey）分别撰文，从实验经济学的角度讨论了借贷关系中诚信机制的建立过程和对经济活动的影响（Camerer and Weigelt, 1988；McKelvey and Palfrey 1992）。其三是委托人—代理人问题。败德行为和逆向选择多与此有关。相应的解决方案则是设计合适的机制，诱发诚信。

第三是对群体诚信的讨论。康杜里（M. Kandori）指出，群体的成员越少，则越容易建立起诚信。维持这个诚信的方法是“传染性惩罚机制”（M. Kandori, 1992）。

本文立足于利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分析诚信体系的决定机制，并在新增长理论的框架内

提出一个思路，讨论其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将诚信定义为诚实和遵守诺言。相应地，诚信缺乏则体现为欺诈、作假和不守信用，是投机行为。诚信缺乏的例子比比皆是，从高校的学生考试作弊、申请出国学生成绩作假、研究人员论文抄袭，到企业的假冒伪劣、上市公司的披露虚假信息，到企业和个人借款不还，不胜枚举。诚信缺乏的毒瘤已经侵蚀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诚信概念是在人际交往中产生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际交往是一种广义的交换关系，是市场交易的延伸。学生考试是学生和社会之间交换：学生告诉社会自己的成绩，社会根据这个成绩给他工作；专家学者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提供给社会或学校，并从学校或社会那里得到种种报酬如职称、尊重、奖励等等。至于企业进行广告宣传和上市公司披露信息，就更是一种交换关系。在这种交换关系中就产生了诚信；诚信足够的话，可以方便交换，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二、诚信决定的基本模型：个人效用最大化中的诚信

社会诚信体系建立在个人诚信的基础之上。个人行为特征以及个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个人诚信状况。诚信固然是一个社会伦理概念，但也包含着经济因素。就个人而言，一方面，诚信是个人参与市场交易活动的前提，良好的个人信誉可以为他赢来广泛的商业机会，从而像资本或劳动一样起到了生产要素投入的作用；另一方面，诚信也是个人效用的来源，毕竟每一个人都有高尚的动机。但是，诚信并不是免费的午餐，良好的信誉是通过事先的投资获得的，是要花费资源的。从社会而言，诚信决定着交易是否顺畅，从而影响着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个人的诚信决定，可以纳入到理性行为的理论框架中分析。

根据上述思路，我们首先可以建立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个人效用函数如下：

$$u(h, c) = (h - \theta)^\alpha c^\beta \quad (1)$$

其中， h 代表诚信， $0 < h < 1$ 。我们可以将 h 理解为当事人说法的可信度，比一种商品达到国家标准的程度，或者一个劳动者提供的有效劳动比例，等等。 c 代表普通商品，这表明诚信起到了类似于普通商品的作用，能够增进个人的效用。 α 和 β 分别表示诚信和普通商品对个人效用的增进强度，其中 $\alpha < 1$ ，表示消费的边际效用递减； $\beta > 1$ ，表明诚信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也就是说，个人诚信的生成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 θ 为一个大于零的正数，代表个人的诚信底线，依不同的人而有所不同。

其次，诚信也是有成本的，这可以在个人的消费约束条件中反映：

$$c = (h^e - \phi)k + \gamma(h^e - h) \quad (2)$$

其中 k 为个人的各种物质的和人力的资本，能够为个人带来收入。每个人能够从物质和人力资本中获得收入，其大小取决于个人的商业信誉，即诚信。但是，个人的商业信誉并不是内外如一的，没有人不坚称自己为人诚实，信守诺言，但实际所为却有可能存在距离。因此，更重要的是交易对象是否相信他的个人诚信。如果相信，交易就会很好地开展，于是一个人就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交易中获得收入。换言之，潜在交易对象对自己的诚信状况的判断影响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发挥，本文称这种判断为预期诚信，用 h^e 表示。显然， h^e 的确定方式影响着预算约束的结构和最终的信用水准。 h^e 可能是根据个人以前的表现推断出来的，例如，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假定 $h_t^e = h_{t-1}$ ； h^e 也有可能是根据对一个人的行为特征来确定。(2) 式右边第一项代表了自己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他人对自己诚信状况的预期所产生的收入。在这一项中， ϕ 代表整个社会对个人诚信的最低要求。(2) 式的第二项表明，维持诚信是要付出成本的，这里的成本体现为收入的减少，减少程度由 γ 表示。因此 ϕ 代表了诚信的价格， h 表明为了维持 h 程度的诚信而花费的资

源。它可能是因为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为了履行合约或遵守诺言而招致亏损，也可能是因为爽约后要赔偿给对方损失。如果在不利的环境下，不守约也不支付赔偿，那就是失信了，用 h 的减少来表示。失信或 h 减少固然可以增加一个人的收入，但同时也损害了自己的形象，导致下一个时期他人降低对自己诚信的评级，即下一个时期的 h^e 下降。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个人是在 (2) 式的约束下求 (1) 式最大化。通过建立拉格朗日函数，可以求得 h 和 c 的解：

$$h = \frac{\alpha(k + \gamma)}{\gamma(\alpha + \beta)} h^e - \frac{\alpha k \phi - \beta \gamma \theta}{\gamma(\alpha + \beta)} \quad (3)$$

$$c = \frac{\beta(k + \gamma)}{\alpha + \beta} h^e - \frac{\beta(k \phi + \gamma \theta)}{\alpha + \beta} \quad (4)$$

(4) 式中 c 与 h^e 成正比，这表明，一个人能够消费的数量取决于他人是否相信自己。越相信，则交易就越顺利，交易成本降低，因而收入增加。(3) 式同样表明了 h 和 h^e 之间的正向关系。别人越是相信自己，自己就越是要做到更有诚信。这倒不是因为出于知恩图报的心理，或者是为信任所鼓励。而是因为，当别人信任自己时，自己的收入增加，消费增加，仓廩实而知礼仪，因而更注重诚信，也更有能力追求诚信。

(3) 式还表明，一个人的诚信状况取决于 α 、 β 、 k 和 θ ，与 α 和 k 成正比，与 β 和 θ 成反比。 α 越大，个人从诚信中获得的满足就越大，也就越是重视自身的信誉。 β 越大的人越有可能是一个物质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对诚信就不那么重视。

更值得注意的是 k 和 θ 。 k 对个人诚信起着积极的作用，这表明，一个人越有能力获得更多的财富，支配更多的消费资源，也就越是崇尚诚信。礼仪廉耻，诚信公德，关爱他人，这些都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从我国的现实中可以看到，收入较高的阶层相对而言更在乎诚信带给自己的感受。当一个人没有能力或机会循正道获取收入时，通过投机行为获取收入不失为一个替代办法。留学生在留学前和毕业后对诚信的不同选择或许是这一结论的最佳注释。一些大学即将毕业的学生为了出国而改动成绩曾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还是这些人，当他们完成学业并建立了一定地位后，就不再愿意有失信的污点，例如他们不愿意为不认识的学生写工作推荐信和申请留学推荐信。同样是留学人员，在国外学习不很突出、难以找到理想工作而不得不回国的归国人员却出现了不少欺骗行径，动辄号称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盛情挽留而毅然回国的。基因皇后的例子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其实，主要不是这两类留学人员的道德素质有差异，他们其实有着类似的效用函数，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更主要地是因为个人人力资本迥异（差别体现在 k 上）。当真正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可以通过自己的人力资本打下自己的事业和支持自己的物质利益时，是绝对不会使用欺骗这种下作的手段。相反，潜力差的留学生中有一些则选择了通过欺骗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增强对物质资源的支配权，因为他们无法通过个人的人力资本来获得成功。这正所谓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盗名。高校里的学术腐败也可以利用这种理论来解释。

对个人诚信起着负面作用。这是因为， θ 代表着诚信的价格，是为了维持一定水准的诚信而需要付出的成本。因此，第一，在坚持诚信或执行合同的成本非常大的时候，人们倾向于采取投机行为，减少对诚信的需求。例如，求职者或求学者请人写推荐信，或是在填表时真实地描述自己的身体状况时总是或多或少地会有一些与诚信相背的行为。第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高能力者倾向于维持更高水准的诚信。如果一个人有非常强的能力，能够正确地判断市场环境，低成本地履行合约，则诚信的价格就非常低了。反之，能力低的人为了维持一定水准的诚信，不得不付出较高的代价。在申请国外高校的学生如何对待自己的成绩时，这一点表现得非常充分：高能力者不会对成绩作假，而低能力者做假的概率要大一些。在向银行贷款并履行还本合同时，实力强的企业要比实力弱的企业更可靠。

三、诚信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是不同的

从模型中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社会诚信的状况取决于 k 、 β 、 γ 和 h^e 的值。这些变量对社会诚信状况的影响在前面已经论及。问题在于，这些变量的值又是如何确定的。在这些变量中， k 与经济发展程度有关， β 取决于制度因素，其他变量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整体诚信状况是不相同的，诚信与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种 U 形曲线关系：

在一个经济停滞的传统静态社会，市场交换活动稀少，因此一方面人们的物质欲望并不强烈，另一方面即使投机取巧也占不到太多便宜。

在高度发达的经济中，物质产品极度丰富，仓廩足而知礼仪，人们更关注精神需求，而且不守诚信的机会成本也更高一些。在这一阶段，人们有更多的收入，除了能够购买普通的消费品外，还需要满足“获得信任”的心理需要，也能支付得起“获得信任”的时间与财物开销。因此，在经济发达的社会中，整体诚信状况要更令人满意一些。经济学家曼昆就说：“当人民不用过多关心是否负担得起生活的物质必需品时，这一切美好的气质（包括诚信）也容易养成”。

但是，在经济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过渡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人们的物质欲望被诱发出来，对高尚情操的向往被对物质的渴望超越；另一方面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违背诚信的机会成本降低，鼓励了更多的投机行为。事实也支持了上述推断。对各国诚信水准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可以发现，在偏远的乡村社会和经济落后地区，民风更为淳朴；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个人行为也以遵守规则为多。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政治腐败与商业欺诈要略多一些。在目前的中国， h 处于 U 形曲线的底部。

社会文化因素和经济发展程度共同决定着 h 的相对大小。在中国，文革的影响较为恶劣而深远，造成思想混乱和信念丧失，中国古代的良好社会准则不再被遵守， h 相对变小。在这种背景下，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开放条件下国外发达经济的示范效应，人们心里的物欲主义被刺激出来，相对于 h 而言， h 变得越来越大。

于中国而言，经济转型过程也是诚信机制不健全的重要外在环境。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旧的制度在被革除，新的制度还没完全建立，不健全的制度阻碍了信息的充分流转，从而减弱了奖惩机制发挥作用。

四、完善的诚信体系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本质上而言，坚守诚信意味着对通行社会规则的遵守，完善的诚信环境是一个良好的非正式制度体系。经济发展理论已经证实，良好的制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非正式制度中，诚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任何一项交易都是建立在信用和信任基础上的。诚信体系不健全，会导致一系列不利后果：其一，为了交易，人们不得不花费资源来证明自己的诚信、搜寻对方的信用和惩罚对方的失信，这大大提高了监督与实施契约的成本。其二，不信任导致人们将市场交换集中在自己的亲朋好友的关系网中，从而分割了市场。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亚洲裙带资本主义的根源之一。其三，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不诚信进一步促进了不诚信，守信者遭受损失，被市场淘汰，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守信者难以独善其身。其四，在一个经济中没有诚信体系，阻隔了与外部的贸易往来。例如，去年 6 月左右，美国加州大学知会全美各大学，让他们注意来自中国某大学申请者的学习成绩真伪。这影响了品学兼优者的前途，严重甚至会阻断国内高校与国际的交流。

法律和诚信体系是维持市场有序运行的两个基本机制。完善的法律体系和高度的社会诚信水准可以大大降低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提高市场运作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

与法律相比，诚信机制是一种成本更低的维持交易秩序的机制。诚信机制建立不起来，不但加大了实施法律的负荷，提高了交易成本，而且法律本身也不可能得到有效执行。法律制度的运行也离不开执法者的信誉。没有了诚信基础，法律能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社会诚信体系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作为社会资本，诚信与物质资本有显著的不同。物质资本是随着使用逐渐损耗的，需要不断更新。社会资本也需要努力维护，但是不会因使用而逐渐减少。它不仅不会逐渐消耗，反而会不断自我增强。诚信越健全，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就会越严厉，使其遭到社会的孤立，则诚信体系越是趋于完善。

五、用新增长理论的思路理解诚信与经济作用的相互作用

诚信体系类似于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变量，既取决于经济增长或发展速度，也影响着它们。因此，诚信体系决定的动态过程可以纳入到内生增长模型里面分析。在这个问题上，卢卡斯的模型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Lucas，1989）。

可以考虑一个同时存在生产与消费的两部门经济。经济中适用的技术为规模报酬不变，但存在由诚信不足引起的交易成本。总生产函数由下式给出：

$$Y = A(hN)^\alpha K^{1-\alpha} \quad (5)$$

其中的符号为：Y 产量，N 劳动投入时间，K 物质资本。h 如前所述，用来说明诚信程度，在此处的具体含义是全部劳动时间中有效劳动所占比例。这一点类似于效率工资模型中的假设。A 是用来说明因诚信问题而引起的交易成本的， $0 < A < 1$ 。一个社会诚信程度降低，会体现为 A 的数值变小，因而在总生产函数中表现为既定投入下产量的减少。其背后的机理是，在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交易者需要花更多的资源去获取信息，筛选交易对象，监督合约是否执行，因而 A 要小一些。

个人的即时效用函数仍然可以用（1）式表示，但消费量的决定应重新考虑。假设每个人只提供一个单位的劳动量，工资水平由 w 表示，则单位人均消费量为：

$$c = h^e w + (1-h)\gamma \quad (6)$$

（6）式表明，雇员所消费的产品来自两个途径：履行交易承诺时获得收入，收入的多少取决于交易对手对自己的诚信程度的认可；进行投机活动时节省资源在其他方面能带来的产品。（6）式右边第一项表示，当雇员提供一个单位劳动时，应该得到的工资是 w，但这取决于雇主是否认可其诚信；如果雇主认为其完全可以信赖，即 $h^e = 1$ ，则雇员可以得到百分之百的工资报酬；如果雇主对其诚信存有疑虑，即 $h^e < 1$ ，则雇员所获工资会被打折扣。（6）式右边第二项表示，如果雇员有投机行为，例如在工作期间暗中干私活，或者是报销假发票，或者是高价进货收取回扣，等等，这就等同于雇员节省了本来按承诺应该贡献给雇主的劳动时间，并将其截留下来挪做他用，从而额外获得消费品。

消费部门与生产部门的联系通过下式体现：

$$c_t N_t + K_{t+1} - K_t = A_t (h_t N_t)^\alpha K_t^{1-\alpha} \quad (7)$$

即

$$[h_t^e w_t + (1-h_t)\gamma] N_t + K_{t+1} - K_t = A_t (h_t N_t)^\alpha K_t^{1-\alpha} \quad (8)$$

如果仍然假定实际工资的确定是由竞争性市场给出，则我们有：

$$w_t = \alpha h_t A_t (h_t N_t)^{\alpha-1} K_t^{1-\alpha} \quad (9)$$

这样，（8）式就会变成：

$$\{h_t^e [\alpha h_t A_t (h_t N_t)^{\alpha-1} K_t^{1-\alpha}] + (1-h_t)\gamma\} N_t + K_{t+1} - K_t = A_t (h_t N_t)^\alpha K_t^{1-\alpha} \quad (10)$$

在这个模型中，还有两个关键变量需要解释，即状态变量 h_t^e 和 A_t 。可以假定这两个变量遵循如下运动轨迹：

$$h_{t+1}^e = h_t \quad (11)$$

$$A_{t+1} = h_t \quad (12)$$

(11) 式表明，交易伙伴会根据潜在交易对方过去的行为来判断其现在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过去的 10 次交易中有 8 次欺骗了对方，则预期他在这次交易中仍然有 80% 的可能性是不诚信的。这是一个奖励与惩罚的机制。(12) 表明，如果判断一个人过去是不诚信的，则与其进行交易时必需加倍小心，需要付出额外的精力来防范其欺诈或违约，这样就增加了交易成本。一个人过去越是不守诚信，则现在交易的成本也就越高，或者说 A 的数值会越小。

将 (11) 和 (12) 分别代入 (6) (7) 和 (9) 式，我们有：

$$c_t = h_{t-1} w_t + (1-h_t)\gamma \quad (13)$$

$$c_t N_t + K_{t+1} - K_t = h_{t-1} (h_t N_t)^\alpha K_t^{1-\alpha} \quad (14)$$

$$w_t = \alpha h_t h_{t-1} (h_t N_t)^{\alpha-1} K_t^{1-\alpha} \quad (15)$$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确定，从长远角度考虑，一个人应该是在 (13) (14) 和 (15) 式的约束下，选择各个时期的消费、诚信程度和资本数量，以谋求下述问题的最大化：

$$\max_{h_t, c_t, K_t} \sum_0^{\infty} \frac{(h_t - \theta)^\alpha c_t^\beta}{(1+\delta)^t} \quad (16)$$

接下来就是均衡解的计算问题。由于上述模型过于复杂，计算的结果中很难看到其直观含义，因此在此处暂时只根据上述思路推理其结果。

一个人在确定诚信水平时，不仅要考虑诚信对其目前即时效用水平的影响，还要考虑到诚信给自己建立的长期信誉资本，有利于自己获取下一次的交易机会和商业利益。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当在交易活动中不能及时判断交易伙伴的诚信状态时，每个人都会有采取投机行为的动机，即个人选择的 h 是小于 1 的，动机大小的决定因素在前面已经做了分析。当各个时期的诚信状态确定下来后，资本积累和产量增长也随之而定。

但是，可以证明的是，最快的增长路径应该是个人在各个时期选择的诚信程度都是 $h = 1$ ，即百分之百的诚信，这样可以促使人均产量的增长达到最大。由于整个社会将诚信看成是人类最需要的优秀品质，从这个角度看，当各个时期 $h = 1$ 时，经济增长是社会最优的。

六、小结

社会诚信状况取决于一个人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文化约束下效用最大化行为。诚信既是一个人的效用源泉，也是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个人也需要为维持诚信付出代价。一个人在与潜在交易对象的不断交易博弈过程中选择了诚信水准。惩罚机制、文化和制度状况等因素是影响个人诚信选择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程度、个人财富存量和社会地位也都有利于促进诚信。

诚信体系类似于社会资本，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内生变量，既取决于经济增长或发展速度，也影响着它们。因此，诚信体系决定的动态过程可以纳入到内生增长模型里面分析。

中国欲建立完善的诚信体系必需如下两个方面入手外：(1) 通过建立全国性的信息共享机制将无数个一次性交易博弈变成一个无限连续的交易博弈。这样可以建立起自动的市场

化的惩罚机制。(2) 促进文化建设, 使退化了的诚信观念重新深入人心。

参考文献

- [1]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J],《经济研究》,2002年1期。
- [2]杨瑞龙,“关于诚信的制度经济学思考”[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5期。
- [3]Basuchoudhary, Atin and John R. Conlon, 2000, Are People Sometimes Too Honest? Increasing, Decreasing, and Negative Returns to Honesty [J],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67 (1)
- [4]Brandts, Jordi and Neus Figueras, 2003, An Exploration of Reputation Formation in Experimental Gam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50 (1).
- [5]Camerer, C. and K. Weigelt, 1988, “Experimental Tests of the Sequential Equilibrium Reputation Model” [J], *Econometrica*, Vol.56 (1).
- [6]Heyes, Anthony, 2001, Honesty in a Regulatory Context--Good Thing or Bad?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5(2).
- [7]Kandori, M., 1992, “Social Norms and Community Enforcement”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59.
- [8]Kreps, D. and R. Wilson, 1982, “Reputation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50: 253-79.
- [9]Kydland, Finn and E. Prescott, 1977, “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85.
- [10]Lucas, R. E., 1972, “Expectations and Neutrality of Money” [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No.4.
- [11]Lucas, R.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22.
- [12]McKelvey, R. D. and T. R. Palfrey, 1992,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Centipede Game” [J], *Econometrica*, Vol.60.
- [13]Parker, D., 1999, Reputation: Studies in the Voluntary Elicitation of Good Conduct by Daniel B. Klein (ed.) [J], *Economic Affairs*, No.3.
- [14]Sobel, J., 1985, “A Theory of Credibility”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pages 557-573.
- [15]Ventelou, B, 2002, Corruption in a Model of Growth: Political Reputation, Competition and Shocks [J], *Public Choice*, No.1.

Credibility and Honesty: Its Formation Processes and Relationship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Wen Jian-dong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using the framework of utility maximization, aims to study individual's choice of credibility and honesty and social level of credibility and honesty that is determined by individual's choi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bility and hones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ndividuals' choice of credibility and honesty is formed in the trading game played against trading partners, which is a result of rational choice. Forces influencing individual's choice of credibility and honesty are individual's wealth, ability, and education, social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redibility and honesty interacts with economic growth. On the one hand, credibility and honesty differs with different growth stage; on the other hand, it influences economic growth whether social system of credibility and honesty is perfect. It can be shown with the framework of endogenous growth that the economy grows in the fastest speed when perfect social system of credibility and honesty prevails over whole a society, but which individuals do not automatically choose.

Keywords: credibility and honesty;economic development;and endogenous growth

收稿日期 : 2004-10-10